

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影响研究的范围,注意影响的途径及效果。前文已言,过往的研究聚焦点多在叙事文学作品(如本生、因缘、譬喻等经典)的研究。其实,非叙事类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比如“论议经”这一特殊文体,它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特性,它的辩论原则、组织结构及伎艺化的表现,对中国讲唱文学实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影响研究最需拓展者,窃以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曰仪式性佛典的文学研究。因为在宗教的组织结构中,仪式与仪轨的形态最为稳定。汉传佛教仪式性佛典的来源,无非两大类:一是佛典翻译,比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属性在于仪式、仪轨。二是汉土佛教依据现实需要并结合汉译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忏、水陆道场、法华忏、金光明忏、药师忏、八关斋文、授三归五戒文等,悉属此类。但无论哪一类,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场合,不同对象授受的经文及接受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别。二曰疑伪经的文学研究。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翻译经典)而言的,虽说其来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数量相当惊人,如唐人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至唐时有疑伪经 392 部、1055 卷,而入藏的真经为 1076 部、5048 卷,两两相较,可以看出当时疑伪经流行的盛况。而且,有的影响力并不比译经低,如《孟兰盆经》、《十王经》、《金刚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它们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就目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学人们关注的重心也仅仅集中于这少数的几部疑伪经上,而绝大多数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学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融汇为一体。因为印度佛教及汉译佛典的传播,除了利用文学这一根本手段外,也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方式,所以,汉译佛典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对此,前辈学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如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二文贯通诗画,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南戏神咒“啰哩哩”之谜》一文从音乐角度,揭示了戏曲神咒及其和声与梵语四流音的关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则系统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乐对中土佛教音乐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则是近年研究佛教东传与戏剧之关系不可多得的力作,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鉴。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之差异性

高文强^①

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思想、艺术等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特征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学也明显具有这一特征。不过,由于深受佛教发展之影响,这一时期佛教文学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又与思想、艺术甚至教外文学的表现状况有所不同。要而言之,其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曰时代差异。

佛教文学之发展深受佛教传播之影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历经近三百年的传播发展,自东晋始逐步走向兴盛,至南北朝遂成为其时之主流文化思潮。佛教传播初期不同时代的巨大差异,直接造成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学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异。

汉魏时期,佛教初传,中原地区的佛教信仰者还是以天竺、西域等地之外来群体为主,因此佛教传播范围并不广泛,影响也较小。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佛经翻译。从汉末的安世高到支楼迦讖,三国的支谦到康僧会,汉魏时期的著名高僧常常也是佛经翻译家。由于当时外来高僧对中国文化认知

^①高文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尚未深入,与文学创作主流群体的文人士大夫基本没有什么交往,故这一时期佛教文学虽已出现,但并不兴盛,零散的一些佛教文学创作基本是围绕佛经翻译展开,内容则主要以记叙佛经翻译情况的经序为主。

两晋时期,玄佛合流,士僧合流,不仅外来高僧对中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而且还涌现出一批本土高僧,其中道安和慧远便是本土高僧的重要代表。因此,僧人与士人之间开始了广泛的交往。这一现象一方面使佛教得以逐步渗透进士大夫阶层并由此奠定其走向兴盛的基础,另一方面,僧人群体与文人群体之间的交融也大大促进了佛教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东晋时期僧人的名士化与名士的佛学化,使得名僧与名士群体趋于融合,支遁就是这类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现象对佛教文学的影响尤为巨大。因此,佛教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颇为兴盛的局面。除了由于佛经翻译高峰的到来形成的大量经序之外,书、论、铭、赞、诗、赋等各种文体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时期佛教文学作品一方面依然有大量宣传佛教的内容,如记叙佛经翻译、阐释佛教理论、赞美佛祖和佛教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抒怀表情的作品,特别是在诗赋之中。因此,这一时期佛教文学发展形成了一个小高峰。不过,这一时期佛教文学作品中多少存在着迎合中土文化的倾向。

进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摆脱依附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而走向回归本原的独立发展之路。它不再披着玄学的外衣将自己装扮成士族,而是走向一切众生,走向世俗化。此时佛教传播依然重视佛经的翻译、佛理的论释,但同时也开始更加重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传播的方式和相关仪式,如转读、梵呗、唱导等便开始广泛流行。佛教这一发展方向的转变,对佛教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南北朝初期来看,佛教文学的创作也开始回归佛教本身,论辩佛理的文章大量涌现,而抒怀表情的文章则突然锐减,以至宋齐北魏各代僧人诗赋创作只有零散数篇。与抒怀之作锐减相对应,关于佛教仪式方面的文章创作则逐步增多,如记载造像、修寺、梵呗、忏悔、斋戒等内容文章便不断增多。至梁陈时代情况又有所改观,由于梁武帝将佛教推至国教的地位,使得梁代佛教文学达到六朝佛教文学的最高峰。这一时期各种内容的佛教文章都有所表现,而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在佛教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其中尤以《弘明集》、《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最具代表性。前两部文集对佛教文学做了一次历史性总结,《高僧传》则将僧传文学推向了高峰,成为后世僧传文学的典范。

佛教文学的发展深受佛教发展的影响,而在中国佛教历史中佛教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使得佛教文学也具有了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在书写六朝佛教文学史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曰地域差异。

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王朝更迭频繁,地域分割治理现象严重。因此,这一时期文化的地域差异现象表现得特别显著。而佛教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直接造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地域差异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南北差异。佛教自东晋开始走向兴盛,而佛教文学也正是从东晋开始繁荣起来。也正是从东晋开始,南北文化的差异开始突显出来。就佛教文化而言,汤用彤曾言:“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梁启超亦曰:“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重理与重教的南北差异,对佛教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整体来看,南方佛教文学关于义理讨论的论说文远远要多于北方,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的收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辩明义理的文章都出自南方僧人之手。而北方佛教文学中关于翻译、造像、发愿、立寺、僧制等内容文章则占了较大比重,虽然也有辩理之文,但与南方也有所不同,正如汤用彤所言:“按佛法之广被中华,约有二端:一曰教,一曰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执。而在中华,则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则生死事大,笃信为上。深感生死苦海之无边,于是顺如来之慈悲,修出世之道法,因此最重净行,最重皈依。而教亦偏于保守宗门,排斥异学。至言夫理,则在六朝通于玄学。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入《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者亦同归而殊途。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内外之争,常只在理之长短。辩论虽激烈,然未尝如北人信教极笃,因教争而相毁灭也。”故北方发生“二武”之教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佛教文学内容存在差异之外,南北佛教文学在文风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观乎北则枝叶生于

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北方重德教，故佛教文风偏于质朴；南方重义理，故佛教文风偏于文饰。比较南北僧人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文风差异。因此，南方佛教文学不仅关于教理教义之文章颇为繁荣，而且抒怀表情之诗赋铭诔亦不少见，甚至有颇具名气的诗僧，如进入钟嵘《诗品》的释宝月便是一位典型代表。然而，后一类文章在北方却极少见到。这同样与南方重文有着密切关系。从这一特征看，可以说南方佛教文学更具文学性，而北方佛教文学更具宗教性。

此外，从总体上来看，南方佛教文学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北方佛教文学的成就。这与魏晋南北朝教外文学的发展状况有着相似之处。

当然，佛教文学的地域差异绝不仅仅表现为南北差异，佛教传播的地域不平衡对佛教文学的异差性也有着较大影响。汉魏六朝时期佛教传播过程中曾形成过若干个佛教中心，如北方的洛阳、长安、凉州，南方的建康、荆襄、巴蜀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佛教文学创作，同样存在着各种差异。这是我们书写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史时同样要注意的问题。

三曰文体差异。

汉魏六朝作为中国佛教文学的发轫期，其文学创作形态与教外文学有着较大差别。由于佛教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服务于宗教的目的，故对不同文体需求状况也就不一样。

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涉及到的文体包括序、记、论、书、檄、启、表、传、碑、铭、诔、颂、赞、诗、赋等十余种一般性文学文体，以及发愿、忏悔、梵呗、唱导等佛教特有之文体。不过，这些文体在佛教文学创作中却存在着与教外文学颇为不同的不平衡性。

如果对今天流传下来的佛教文学作品进行一下统计比较，可以发现，从文笔大类来看，无韵之笔占了近80%的比例，有韵之文的创作要少得多，这一状况显然符合佛教文学以服务于佛教为主要宗旨这一基本精神。

在无韵之笔各类文体中，经序数量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尤以魏晋时期为最。显然，这与魏晋时期佛教传播以佛经翻译为主密切相关。经序主要记载译经的时间、地点、译者、缘由等基本情况，其记叙特征为佛教文化保存了大量重要文献。进入南北朝后，除了经序依然占有较大比重之外，阐释与辩难佛教义理的书、论文章也开始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南朝各代，这与东晋南朝时期大量出现的佛教论争有着密切关系。从东晋时的沙门不敬王者之争、袒服之争，到南朝的夷夏之争、黑白之争、神灭神不灭之争等等，每一次论争，都会出现一批书、论之文，尤其是神灭神不灭之争，在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组织的两次论辩中，产生了将近百篇论争之文，南朝类似活动的大量存在，无疑推动了书论体文章的大量涌现。除了经序、书论外，传记体也是无韵之笔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数量也不在少数，且多以著作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的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此外还有宝唱的《名僧传》和《比丘尼传》等等，这些僧传的大量出现，为后世僧传创作开拓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在有韵之文各类文体中，诗歌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不过，佛教文学中诗歌体裁的出现，是稍晚一些的事情，大约到了东晋时期才开始出现佛教诗歌，显然这与僧人和文人的密切交往有关。正是从东晋开始，高僧与名士才开始交往密切。在士人那里，诗歌原本是缘情之作，但佛教诗歌的功能与教外诗歌显然不同，除了部分言情之作外，佛教诗歌更重要的内容是说理与赞佛，如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鸠摩罗什的《十喻诗》，庐山诸道人的《观化决疑诗》，惠令《和受戒诗》等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这一时期的佛教诗歌常常还保留着诸如“偈”、“赞”等佛教名称，如支遁《文殊师利赞》、《弥勒赞》、《维摩诘赞》、《善思菩萨赞》、《月光童子赞》，慧远《报罗什法师偈》等就是如此。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佛理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个新的类别，也因此推动了中国哲理诗走向兴盛。除了诗歌之外，有韵之文中其他各类文体作品的数量都不是很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所特有的发愿、忏悔、梵呗、唱导等文体至今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但它们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对教外文学的影响，都是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期佛教文学史时应给予特别关注的。如梵呗对音韵格律的影响，唱导对说唱文学以至小说的影响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的时代差异、地域差异和文体差异，一方面表现出这一时代佛教文学的基本特

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一时代佛教文学的复杂性。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的这一特点,是书写这一时段佛教文学史时应尤为注意的。

宋代佛教文学的基本情况和若干思考

张培锋^①

宋代佛教文学非常兴盛,成就巨大,无论是诗、词还是文、赋乃至宗教传记,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人物和作品。面对这些作品,我们要在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上有所突破,有所超越。

宋代政治自始至终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佛教、道教等宗教意识形态,被纳入到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并最终形成“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三教并举的局面。宋代的科举考试较之前代更为完备,奠定了其后上千年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科举的方式也进入佛教领域,即通过“试经”方式选取僧才,很多僧人是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佛门的,宋僧元照《释门登科记序》径直将度僧制度称之为“释门登科”,便充分表明世俗科举制度对宋代佛教制度的影响。这样,与前代僧人相比,宋代僧人的文化素质、水准等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宋代佛教文学极为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佛教文学异常兴盛,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与宗教内在的相通。按照宋人“以佛治心”的功能界定,佛教统领着人类的心灵、精神世界,而文学,其最基本的指向也是人类的精神领域。这样,两者便有着奇妙的异质同构关系,文学所创造的“太虚幻境”与佛教所建构的“心灵净土”,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相通了。当然,文学与佛教的这种内在相通性,并非从宋代才开始,但宋人对此阐述得最透彻,实践得最得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诗僧”在唐代僧人中还是一个很小、很特殊的群体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几乎可以用“诗僧”这个概念概括大多数宋代僧人。宋代僧人特别是那些高僧、名僧,不能作诗的几乎没有。从数量上看,清代厉鹗编的《宋诗纪事》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收入释子诗共计242人的上千首作品,这些远非全部。已经完成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学总集都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僧人作品,其数量之巨大,远远超过前代。除了一些可以完全归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外,僧人还创作了数量更为巨大的偈颂、唱赞、语录文、笔记文、仪轨文等作品,这些作品,通常不被视为文学创作,其作品分类也比较混乱,但其中多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富有文学价值,有待深入挖掘和整理。四川大学李国玲编著的《宋僧著述考》一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汇集了宋代僧人的各类著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书收录宋僧著述1183种,其中现存的818种,佚亡的365种。但是,《著述考》涉及的仅是成部的著作,事实上,很多僧人可能只留下一两首诗或者三、四篇文,这些就很难反映在该书中。所以,宋代僧人著作的数量是巨大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宋代佛教文学史研究将打破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累积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和人为设置的藩篱,放宽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大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本来是中国文学一个优良传统,举凡诸子、史传乃至歌曲、谣谚,皆具有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可供研究的对象,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也没有那么狭隘。但是,后来的一些学者为了“保卫文学研究的纯洁性”,更加强调所谓“纯文学”,于是大批作品就被排除于文学研究范围之外,而且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一些“不纯”的文学,在取舍上、评价上就难免受到局限。比如,宋代佛教史上一些大家,如前面提到的延寿、智圆,以及赞宁、重显、契嵩、惠洪、克勤、宗杲等等,其实也是当时的文章大家、史传大家、诗赞大家、语录大家,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一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和文坛。又如,天台宗僧人遵式号称“慈云忏主”,在有宋一代地位尊隆,他所制订的多部礼忏仪轨,对后世佛教影响甚大,有些赞偈至今仍在寺院中唱诵,这些作品当

^①张培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